***Pictures for Use and Pleasure: Vernacular Painting in High Qing China.* By JAMES CAHI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ix, 265pp.**

顧頡剛曾言：「許多偽材料，置之於所偽的時代固不合，但置之於偽作的時代則仍是絕好的史料：我們得了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個時代的思想和學術。」（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自序」，頁8。）顧頡剛運用「偽史移用法」，寫下了〈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等文章。中國藝術史研究學者高居翰(James Cahill)於2010年出版的 *Pictures for Use and Pleasure: Vernacular Painting in High Qing China*（《致用與怡情的圖像：大清盛世的世俗繪畫》，以下簡稱《致用與怡情的圖像》）一書研究的對象大多是添加了偽款或者年代錯置，被視為偽作的繪畫。從這一角度而言，《致用與怡情的圖像》運用的材料、論述的主題都是新穎的。

另一引起筆者注意的是，《致用與怡情的圖像》研究的是繪畫作品，書名卻選用了「圖像」(pictures)一詞。2006年高居翰發表了題為〈明清時期為女性而作的繪畫？〉的文章(James Cahill, "Paintings Done for Women in Ming-Qing China? ", *NAN Nü*, 8: 1 (2006): 1-54)，文章題目用的是繪畫(painting)一詞。〈明清時期為女性而作的繪畫？〉一文論述的主題亦是《致用與怡情的圖像》一書重點探討的幾項議題之一。在該篇文章中，高氏在討論「蘇州片」存在着批量生產的摹本或者仿本的現象時，提出「如果我們將批量生產的手卷視為圖，而不是畫的話」的看法。「圖」的提出，是基於對這類畫作實用性質的考量。對此，畫作的眞偽不是關鍵。《致用與怡情的圖像》一書選用「圖像」一詞，是否出於類似的意圖？從書名亦可知，這類畫作有着實用或者娛樂的目的。

全書共五章，分別是第一章「辨識世俗繪畫」(Recognizing Vernacular Painting)，第二章「城市和宮廷的作坊畫家」(Studio Artists in Cities and Court)，第三章「西法的運用」(Adoptions from the West)，第四章「畫家的繪畫題材」(The Artists' Repertories)，第五章「美人畫與妓女文化」(Beautiful Women and the Courtesan Culture)。各章要點如下。

第一章「辨識世俗繪畫」。高居翰首先對本書的研究對象「世俗繪畫」(vernacular painting)進行界定，世俗繪畫是城市作坊畫家以院體畫風格描繪

日常生活和通俗文化的畫作，這類畫作主要是為了滿足室內裝飾以及其他用途的需要。涉及的時段為17世紀晚期到18世紀，包括了康雍乾三朝；涉及的地域主要為江南城市如蘇州、南京、揚州等和18世紀初興起的北京。接着以李日華和無名畫家、王時敏以及顧見龍為例，闡明文人畫與世俗繪畫在畫家身份、畫作的風格、題材等的差異。最後對本書可能涉及的議題如城市作坊畫家、畫作的社會功用以及地位、女性作為繪畫的消費者和觀看者，作一提綱挈領的勾勒。

第二章「城市和宮廷的作坊畫家」。首先介紹了清代早期活躍於江南城市的作坊畫家，如施胖子、華烜、殷漌、康濤等，接着重點考察了前往北方尋求贊助人或者有機會進入宮廷畫院的作坊畫家。作者認為這些作坊畫家不是如既往所認為的只是將宮廷所學帶回城市，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宮廷畫院，為宮廷畫院帶來了新的繪畫技巧和主題。宮廷是城市的延續。在這些往來於宮廷和城市之間的畫家，作者聚焦於張震、張為邦、張廷彥祖孫三人。以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雍正行樂圖》為例，作者基於對畫作成對的動物形象、女性形象和服飾的描寫的分析，認為這件作品可能為張震或者張為邦所作，或者二人同時參與了這件作品的創作。同時作者注意到《雍正行樂圖》中的女性着漢服，對此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滿族統治者如何看待漢族文化，尤其是江南城市的通俗文化和色情文化。《十二美人圖》、《乾隆行樂圖》亦是如此。這類美人畫題材在宮廷的出現，說明這類題材迎合了宮廷帝王的喜好，同時亦是將滿漢之間的關係作一性別化的視覺表達。最後以焦秉貞、冷枚、陳枚為例，討論北方人物畫派在宮廷之外的繪畫創作活動。

第三章「西法的運用」。作者主要探討城市作坊畫家如何運用來自歐洲的新的表現技法和風格元素，為傳統的世俗題材開創出新天地，尤其是室內人物畫。作者強調要區分兩種不同系統的繪畫模式，一種是通過書籍或者耶穌會士所帶來的意大利體系的直線透視法(linear perspective)，一種是來自北歐（主要是荷蘭和佛蘭德）的模式，採用明暗對比，通過窗戶、門等構圖元素使空間向縱深發展。後一種模式更容易為城市作坊畫家所接受。此外，作者認為清代早期宮廷畫院的西來因素，不僅有直接來自江南畫家和服務於宮廷的耶穌會士的影響，而且極有可能間接地受到北方早期人物畫家的影響。在勾勒北方人物畫在18世紀的發展情況時，作者注意到18世紀的人物畫更為自然，更為人性，如崔徽的繪畫作品，與清初存在着斷裂，此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第四章「畫家的繪畫題材」，主要介紹城市作坊畫家可能涉及到的繪畫題材，包括為新年、生日、婚禮等場合創作的繪畫、敘事畫、城市景觀等。在討論家庭集體照或者描繪家庭日常生活場景的繪畫時，作者提出一個問題：是否存在為女性創作的繪畫？作者推測小說或者戲曲的插圖有展示女性自我的一面，而不是物化成男性欲望的載體，處於同等地位的女性之間的友誼這類畫作的主要觀看者可能為女性。

第五章「美人畫與妓女文化」，作者將美人畫置於明清發達的妓女文化背景下予以考察，注意到18世紀的美人畫越來越以男性的視角為中心，完全不同於明末清初的情形。這一轉變與女性地位的下降、女性商品化的加劇、妓女在清代逐漸邊緣化，以及見於晚明小說、戲曲的妓女和文人之間的才子佳人的浪漫被閨秀文學所取代不謀而合。作者進而討論這類畫作懸掛的場所，小說、戲曲為此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但作者認為在利用這類材料時需謹慎，尤其是小說、戲曲中美人畫與眞正的肖像畫混淆不清的情形，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美人畫和肖像畫是不同的類別，有着各自的慣例(convention)。關於美人畫懸掛的場所，最佳的證據來自於《紅樓夢》。在小說中，男性與女性的臥室懸掛的美人畫在時代、作者、風格方面呈現出差異。對於美人畫的研究，向來不受重視，而且經常對仕女畫與美人畫不加區分。作者嘗試從時代風格的變遷，勾勒出明清美人畫的發展脈絡。

《致用與怡情的圖像》一書的材料、研究主題是新穎的，但研究方法延續了作者之前的治學之道。其一，風格分析。高居翰早年師從羅樾(Max Loehr)。羅樾開創性地將風格分析引入到對安陽青銅器紋飾的分析，提出了有名的安陽風格五種說。高居翰一直強調從圖像出發，尤其是在研究這類相關文字資料缺乏的畫作。雖然個人風格不是本書關注的重點，但作者嘗試勾勒出北方人物畫以及美人畫的發展脈絡。其二，藝術史的社會層面。早在《山外山：晚明繪畫（1570-1644）》(*The Distant Mountains: Chinese Painting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1570-1644*)一書中，高居翰在分析畫家及其作品時，綜合考慮地域、社會經濟地位、理論立場、交遊等因素可能對畫家畫風施加的影響。《致用與怡情的圖像》將美人畫置於明清時期變遷的妓女文化背景之下考察，探討了傳統繪畫史不甚關注的議題，如畫作懸掛的場所、女性作為世俗繪畫的消費者和觀看者等。其三，西方的影響。在《氣勢撼人：17世紀中國繪畫中的自然與風格》(*The Compelling Image: Nature and Styl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一書中，高居翰曾提出晚明某些畫家受到西洋繪畫風格元素的影響。在《致用與怡情的圖像》一書中，高居

翰不再使用「影響」(influence)一詞，認為影響意味着一強勢文化對另一文化的強制推銷，而是使用採納(adoption)一詞，賦予行為者以主動性。如高居翰認為城市作坊畫家更傾向於採用來自北歐的繪畫模式，而不是意大利的直線透視法，恰是自主選擇的結果。

作者謙言《致用與怡情的圖像》一書只是重建中國繪畫史上缺失的部份，但同時亦是對中國繪畫史上佔主流地位的文人畫研究的一種反思。《致用與怡情的圖像》拓寬了中國繪畫史的研究範圍，首次對「偽作」、「蘇州片」作出學術性的研究。

將《致用與怡情的圖像》與柯律格(Craig Clunas)於1997年出版的《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文化》(*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相比較，會發現二者研究的時段雖不同，但二書研究的對象都是傳統藝術史不甚重視的圖像資料，《致用與怡情的圖像》主要集中在畫作之上，《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文化》關注的範疇更為廣泛，關注的是「物品之上的圖像」，不僅包括了繪畫，也包括了版畫和其他器物之上的圖像，如漆器、陶瓷等。柯律格利用這些圖像資料，討論明代的圖像生產和圖像觀看。《致用與怡情的圖像》雖然討論的是繪畫，但在涉及繪畫原本的使用場合以及觀看等問題，二書仍有共通之處。如《致用與怡情的圖像》討論的《十二美人圖》原本是圍屏之上的繪畫。在繪畫的「歷史物質性」方面，則仍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

劉芝華
中山大學歷史系

Gourmets in the Land of Famine: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Rice in Modern Canton. **By SEUNG-JOON LE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xviii, 300pp.**

作者李丞浚(Seung-joon Lee)嘗試以一個新的角度來看國民黨的歷史，也嘗試以城市社會史的角度來看近代中國的米穀貿易。作者的主要論點是國民政府提倡食用國產米，並輔以進口米稅來加重洋米米商的負擔，從而達到以國產米代替進口洋米的政策最終是失敗的。其主因是國民政府只考慮米穀的供應量，而沒有考慮國產米的品質。廣州居民一直在排斥品質在絲苗和洋米之下的蕪湖米和湖南米，國民政府希望在粵漢鐵路通車後把湖南米引進廣州